

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

谭好哲
马龙潜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谭好哲 主编

文艺学前沿理论研究书系

文艺学前沿理论研究书系

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

主编 谭好哲 马龙潜

撰稿(按写作顺序排列)

谭好哲	马龙潜	刘 林	王汶成
凌晨光	仪平策	卢晓辉	吴高泉
程相占	赵利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谭好哲，马龙潜主编．—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10
(文艺学前沿理论书系)
ISBN 7-5607-2220-2

I. 文… II. ①谭…②马… III. 文艺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16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胶南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75 印张 356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本书系为山东大学“211 工程”学科建设立项项目

文艺学前沿理论研究书系

编 委 会

主编 谭好哲

编委 谭好哲 马龙潜 王汶成

凌晨光 李鲁宁 程相占

薛中文 尤战生

总 序

20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学研究作为人类整体思想文化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派纷起，新见迭出。我国的文艺学理论与学科建设自新时期开始，也逐渐跟上世界文论发展的步伐，在现代性的策动下，呈现出了崭新的生机和充沛的活力。其间，文艺学理论研究在体系建构、观念创新、方法借鉴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毋庸讳言，在追“新”逐“后”的学术风气影响下，不少研究者也滋生了浮躁的心态，不能沉静心境，扎扎实实地从事切实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生成性的基础研究。所以，文论界虽不乏热闹的话题、新异的见解，但真正具有范本性质、能够标志一个时代理论水准的精品力作却不多见。这种状况致使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常常既不能成功应对和解决社会审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问题，也不能有效地用于对历史现象的正确考量和对未来走向的科学导引。在这种学术态势和状况之下，作为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艺学研究者，其努力方向应是不言自明的，而本书系的理论探索方向与学术追求目标也就自然地得以界定，即着眼于当代文艺学领域中具有前沿性质的重要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

16.72/04

外当代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努力挖掘和开发中国古代文论材料的当代价值和深层意蕴，以综合创新的姿态为我国当代文艺学理论与学科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

所谓“前沿”并不仅仅体现为时尚的理论话题和前卫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文艺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恰恰是那些每个时代都能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激发人们探索的兴趣的亘古常新的问题，比如“再现”、“表现”、“形式”、“结构”、“理解”、“意义”等。在当代审美文化现实的语境中对上述问题作出适应时代需求的重新阐释，并以此促进人们当代文化艺术审美观念的丰富和完善，与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步伐相协调，并以理论本身的前瞻性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加以预测和引导，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理论之“前沿”意义的真正内涵。

学术理论的前沿性又与学术理论的综合创新相一致。如果说前沿性显示的是理论的定位与姿态的话，那么，综合创新则是理论的目标取向与实现途径。综合创新，体现于视野、观念、方法诸多方面。以开放性的学术视野，在广泛吸取中外文艺学、美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理论综合，达致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是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所在。而在这其中，如何在当下的理论创造中，实现理论研究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协调，成为一个应予重视的时代性课题。理论研究在今天，仍面临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与本民族时刻存在并不断变化的文艺现状和审美文化实践相伴随、相纠结的问题。就我国文艺学研究而言，综合考察中国文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把民族性问题置放于现代理论建设的语境中去探讨和把握，推进中国文艺学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而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理论，正是综合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充分体现。

总之，扣紧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在综合创新中建设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理论体系，这是本书系的研究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和宗旨，至于结果和成效如何，只有留待大家的批评了。

谭好哲

2000年12月20日

主编简介

谭好哲，1955年12月生，山东栖霞人。山东大学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自著《感性的超越》和《文艺与意识形态》二部，另主编或与人合著《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中国文化概论》、《伟人的咏唱》等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论著获省部级奖励十余项。

主编简介

马龙潜，1945年7月生，辽宁省辽中县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已出版《实践建构美学初论》、《反映建构艺术现象学》、《当代文艺学——美学观念引论》、《论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合著）、《文艺学当代形态论》（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已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著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目 录

绪论 从对话中走向新的理论综合·····	(1)
一、文论话语：从对立与冲突到对话与综合·····	(2)
二、文论对话的四个向度·····	(11)
三、走向当代文论建设的综合创新·····	(19)
第一章 文艺基本观念与文艺结构形态·····	(34)
第一节 当代文学艺术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	(35)
第二节 当代文学艺术主客体关系结构·····	(48)
第三节 当代文学艺术的美的形态·····	(56)
第二章 文学形式与文学本体·····	(65)
第一节 西文现代“形式本体论”的流变·····	(66)
第二节 中国当代“形式本体论”的兴起·····	(79)
第三节 新世纪“形式本体论”研究刍议·····	(89)
第三章 言论转向与文学语言研究·····	(100)
第一节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言论转向”·····	(100)
第二节 20 世纪文学语言研究的三大成就·····	(108)
第三节 “标异冲动”与综合的发展趋势·····	(118)
第四节 走向文学语言的综合研究·····	(124)

第四章 语言中介论与文学整体观·····	(140)
第一节 历史上的三种文学语言观·····	(140)
第二节 语言的中介作用与文学整体的构成·····	(154)
第三节 语言的中介作用与文学活动的过程·····	(160)
第四节 语言的中介作用与文学对立关系的整合·····	(166)
第五章 文学交流与意义阐释·····	(179)
第一节 对话、交往和艺术交流·····	(180)
第二节 文学交流的条件、特征与效力·····	(193)
第三节 交流关系中的意义阐释·····	(202)
第六章 文化人类学范式与文学民族性研究·····	(219)
第一节 文学民族性的深层追向·····	(219)
第二节 文化人类学及其分支和学派·····	(225)
第三节 人类学范式与文艺学研究·····	(240)
第四节 反思、回归与重构·····	(253)
第七章 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文学传统·····	(259)
第一节 文化学视野中的中华民族心理特点·····	(260)
第二节 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风貌和总体特征·····	(273)
第八章 大众文化与审美幻象·····	(282)
第一节 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生、发展和特色·····	(283)
第二节 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理论·····	(295)
第三节 作为审美幻象的大众文化·····	(316)
第四节 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视野·····	(330)
第九章 范式转换与文论创新·····	(334)
第一节 论题的由来与争鸣·····	(335)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对立紧张的思想文化根源·····	(342)
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杂文学文论范式·····	(354)
第四节 20 世纪的纯文学文论范式·····	(364)
第五节 统会问题、适度诠释和抽象继承·····	(382)

第十章 艺术审美与人的解放·····	(390)
第一节 艺术与人的生存理想·····	(390)
第二节 艺术与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	(399)
第三节 审美体验与人的生命活动·····	(403)
第四节 艺术的唤醒功能·····	(410)
第五节 当代视野中的艺术与人生·····	(417)
后记·····	(428)

绪论：从对话中走向新的理论综合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筑起一个融民族性、现代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于一体的博大精深的文论体系，已成为广大文艺理论研究者面向新世纪的理想追求。而要实现这一理想，没有对古今中外文论成果的借鉴吸取与革新转化是不行的，这一点已成为文论界的共识。然而在究竟应该如何进行这种吸取与转化的工作方面，研究者们却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回答，做出了一些不同的尝试，甚至可以说各人有各人的见识与做法。在我们看来，立足对话，面向综合，可能不失为一种可行并较好的思路或策略。所谓对话，也就是不同的甚或是完全异质的文论派别与话语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它是理论综合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所谓综合，就是要博采各家各派文论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点上进行创造性构建，它是理论创造走向博大精深之境的一个必要环节。就二者的具体关系来说，综合是目的和归宿，对话是手段和途径。没有对话，就不会有真正的综合；反之，高质量高层次的理论综合也必须以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为前提和条件。

一、文论话语：从对立与冲突到对话与综合

今天提出对话与综合问题，首先有其历史缘由。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立与冲突多于对话和交流，与此同时，对艺术的认识和批评也是单面性的思维多于整体性的综合。由于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世界处于一个民众觉醒、政治变革的时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十分匆促与迅猛，社会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尖锐，因而文艺领域包括文艺理论与批评中争夺话语主导权和控制权的斗争自然也极其剧烈。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政治格局和文化氛围的转换，人们往往把某一种话语奉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和信条，置于正统地位，而将另外的话语视为谬误和异端，置于排斥之列，甚至作为否定与批判的对象。西方现代文论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前后相继的各个流派和不同学说迭相否定的历史。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这种发展态势在我国也表现得尤为显明。

我们知道，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学科部类之一，现代文艺学研究的早期存在形态是 19 个世纪的文学艺术史研究。在历史主义观念和实证主义思潮的浸润、影响之下，文学艺术史研究在 19 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成为当时文艺研究的主导范式，丹纳的《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波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甚至较早一些的黑格尔的《美学》，都堪称经典之作，恩格斯就曾深为黑格尔美学中巨大的历史感所折服。与西方传统的以制定文艺创作规范为目的的标准诗学和近代以来兴起的建立在主观鉴赏基础之上的文艺批评不同，19 世纪经典的文学艺术史研究，侧重于从外在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甚至自然环境等客观背景考察和分析各民族文学和艺术生长发育的影响

因子。这种文艺研究范式不仅在 20 世纪初期受到了以克罗齐、科林伍德为代表的表现论美学的直接冲击，更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本体论批评”和“内部研究”派的强力排斥。如果说 19 世纪的文学艺术史研究采取的是“社会学”取向的话，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总体走势上则是以“语言论转向”取代先前的“社会学”取向，研究重心转向了由语言和形式构筑起的艺术存在本身或艺术的存在本体。而到 20 世纪下半叶，这种范式又面临危机，遭遇到新的挑战，以存在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诗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等文艺研究与批评流派的相继登场为标志，西方的文艺研究又形成了以“文化学转向”取代“语言论转向”的趋向，即突破“本体论批评”和“内部研究”的狭隘视界与人为禁锢，使文学艺术重新回归到社会历史文化本位上来，恢复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固有联系，在更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中来研究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这是从纵向的历史演进角度来说，而从横向的共时结构关系来看，由于其内在精神的不同，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总体上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对立的思潮和倾向。如果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表现论美学对 19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思潮的反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相互对峙与纷争的滥觞的话，那么随后继起的各种现代文论与美学流派，基本上都可以归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潮之中，并且都是在共时性的对立或历时性的否定中，在即此非彼的偏激、偏执、片面中彰显出各自的特色和价值。对于西方现代文论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已有许多的研究者指出过，并作过深入的分析，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反观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有着与西方现代文论大致类似的情形。就总体格局而言，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人们用从欧美引进的近现代资产阶级文论颠覆古代文论系统；五四运动以后至六七十年代，又逐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帜下将古代文论和欧美现代文论打入历史冷宫；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人又企图以复活古代文论话语的名义或全盘移植现当代欧美文论的手段动摇或解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说，无论是在20世纪初叶，还是二三十年代，拟或是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几乎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都伴随着占据主导地位或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观念和文论形态对先前与同时代的其他文艺观念和文论形态的无情拒斥乃至断然否定与激烈批判，我优你劣、你死我活的思维心态和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始终笼罩与制约着本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此种状况致使文论研究充满了政治上的热情，凸显出思想上的力度和宣传上的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明显的缺憾，如多了几分学术上的独断与霸气，少了些科学上的冷静与宽容，多了几分画地为牢的界限意识，少了一种包容涵括的大家风范。检索与总结现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成就便不难发现，我们不乏攻城拔寨的勇士，意气风发的名家，但缺少汇纳百川的鸿儒，博大精深的大师。许多现代文论名家的论著，今天读起来都不免给人思想偏狭、内容单薄之感。其实，不独中国，就是西方现代文论，也很少再有康德《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美学》那种结构宏大瑰丽、思想丰富深邃的鸿篇巨制。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对话心态和综合意识的欠缺具有一定的关联。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正是由于意识到固守单一的理论与批评话语不能解决文艺的真理性问题，认识到在文艺研究领域任何试图垄断话语解释权的努力都是不明智的，故而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相互否定与冲突的发展历程之后，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西方许多文论家都开始祭起了对话与交流的理论旗帜。比如，在早年把接受者置于艺术活动尤其是艺术审美首要地位的尧

斯，到晚年意识到仅仅将文学作品的接受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而把作家排除出去是片面的，于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和马克思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中吸取营养，试图建立一种文学交流理论，借此来正确看待艺术生产与接受互相作用的功能。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则不仅提出了“对话批评”概念，阐明了开展对话批评是通向艺术真理的一条途径，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结构主义的“内在论”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批评（他称之为“教条批评”）加以综合，以双方之长补彼此之短的主张。他认为，持“内在论”立场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注重文学内在构成因素的分析，但往往割舍了艺术形象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意识形态批评则又往往持外因决定论的观点，忽视了对文学内在构成的分析，“这样，‘结构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缺陷就可由意识形态专家来弥补，反之亦然”。他又说：“文学与伦理：‘真可怕！’我们的同代人会由衷地感慨……但文学与价值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因为排除价值而谈文学是不可能的，也因为写作行为是一种交流行为，它意味着在共同价值基础上互相理解的可能性。”^① 在这里，托多洛夫不再像其他结构主义理论家那样抽象地看待文学，而是把文学视为与人类生存有关的、通向真理和道德的话语。因而他要求恢复文学与伦理和价值判断的联系，就是要求文学研究从对文学内在构成因素的片面沉醉中摆脱出来，把文学置于与时代、作者、文学传统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研究，从文学“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中，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中来提升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托多洛夫还明确地提出了走向文学的综合研究的主张。他在1985年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谈中说：“60年代，法国文学理论中

^①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6、179页。